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舟山佛教对外传播研究

性 纯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浙江舟山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途径之一，与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舟山位于东海之滨，其独特的海洋地位也成就了其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舟山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唐代，在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成为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海运航道。舟山的佛教文化也因舟山海运的兴盛得以向日韩传播。本文以鉴真东渡、慧萼在普陀山搁浅事件以及普陀山新罗礁、高丽道头遗迹来阐述舟山佛教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佛教；舟山

【收稿日期】2026 年 10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1 月 20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76

A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Zhoushan Buddhism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hun Xing

The China's Buddhist Academy of Mt.Putuo, Zhoushan, Zhejiang

【**Abstract**】The Maritime Silk Road served as a vital condui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holding a significance equal to that of the overland Silk Road. Situated along the East China Sea, Zhoushan's unique maritime location established its pivotal role within this network. The Maritime Silk Road via Zhoushan emerg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zenith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unctioning as a primary maritime route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Consequently, the prosperity of Zhoushan's maritime trade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Buddhist culture to Japan and Kore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Zhoush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key historical events—such as Jianzhen's voyage to Japan and the incident involving the monk Hui'e, whose ship was stranded at Mount Putuo—as well as archaeological sites like "Silla Reef" (Xinluo Jiao) and "Goryeo Daotou" (Gaoli Daotou) found at Mount Putuo.

【**Keywords**】Maritime Silk Road; Buddhism; Zhoushan

丝绸之路是我国与海外贸易、交流的重要交通方式，有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舟山作为我国东海沿岸的海滨城市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我国对外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交往交流中，也包含了佛教文化的交流。舟山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佛教文化，那么舟山的佛教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何关联？本文将以此展开说明。

1 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

丝绸之路指的是汉武帝时期，为了平定边疆、联合月氏消灭匈奴，而派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形成的一条商贸通道。它以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走廊和西域，一直连接到地中海沿岸，是一条陆上的通道。“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费尔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于 1877 年在《中国》第一卷第二章中首次提出[1]。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核心通道，也是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丝绸之路提出的 90 年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 1967 年在其著作《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中首次系统提出了另外一条与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相对应的海上丝绸之路[2]。这条路主要从我国的东南沿海出发，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各国后，再进入印度洋和红海，最后抵达东非及欧洲各国。无论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是我国古代与西方国家交往的通道。其所交往的不仅仅是商贸货物，同时也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佛教是在印度婆罗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属于印度文化的代表。就当今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来看，中国佛教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不仅具有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同时还是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中心。可以说，如果佛教当年

未被传入中国，那么当今的世界佛教或许只有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上座部佛教了。佛教何以能够传入中国以及中国佛教何以能成立，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丝绸之路。如任继愈所讲“佛教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国内地。”[3]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大多是通过陆地丝绸之路而实现的。如最早从事佛经翻译将佛典传入我国的安世高、支娄迦谶以及作为四大译经家之一的鸠摩罗什等，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经过西域抵达长安，进而开始了在中国的佛教事业。

佛教向中国传入的途径除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之外，同样也存在着以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的。梁启超甚至还主张，海上丝绸之路才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途径。他认为佛教并不是从陆路而来，而是经由海路传入的，它最初的根据地也不在京洛一带，而是在江淮地区[4]。还有学者根据康僧会、支疆梁接在中土最初活动的区域为南方的交趾，于是认定他们是通过海路入华的，将他们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早的佛教传播者[5]。“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人员的佛教信仰，是佛教海路来华的传播动力”[6]。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僧人法度即是如此。据《高僧传》所载，法度的父亲为天竺人商人竺婆勒，他“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长名金迦，入道名法度。”[7]与法度同一时代经由海路入华的还有昙摩耶舍、求那毗地、求那跋陀罗、求那跋摩等人。昙摩耶舍为罽宾僧人，有关他的记载，《高僧传》所载：

> 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8]

慧皎在《高僧传》中虽然没有指明昙摩耶舍是从海路入华，但从他抵达我国的地方，“初达广州”即可看出昙摩耶舍只能是由海路而来。求那毗地的入华方式是有明确记载的，《出三藏记集》中：

> 是以外国僧众，万里归集，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赠往来，岁时不绝。[9]

求那跋陀罗入华是在刘宋元嘉十二年（435），是从海路经由师子国（现斯里兰卡）等地而抵达广州。据慧皎的记载：

> 遂弃邪从正跋陀前到师子诸国……乃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元嘉十二年至广州。[10]

求那跋摩从南海抵达广州并非出于计划安排，而是随风漂流所至。

> 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故其遗文云：业行风所吹，遂至于宋境，此之谓也。[11]

在中国佛教史中，经由海路入华的还有很多，其中对中国佛教产生影响较大的有四大译经家之一的真谛、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密教祖师不空三藏。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舟山与海上丝绸之路

舟山，我国东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位于浙江东北部的群岛，有海天圣境、千岛之城的美誉。它地处中国东部黄金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杭州湾外东海洋面，背靠上海、杭州、宁波等长三角经济腹地，东临太平洋，具有很强的地缘优势，还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早在 1987 年，舟山就建立起舟山港并投入使用。舟山港自建立起来已形成多条航道，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舟山也成为了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2017 年，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自贸区，这也再一次说明了舟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舟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春秋时期，舟山群岛隶属于越国，被称为“甬东”。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年），秦国降服越国，设置会稽郡，舟山即属于会稽郡鄞县东境地。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设翁山县，隶属于明州（今为宁波），于大历六年（771 年）废县。北宋熙宁六年（1073 年），设昌国县，辖舟山群岛，属明州。元代元贞元年（1295 年）昌国县升为昌国州，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 年）实施海禁，废昌国县，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设定海县，仍隶属宁波府。新中国成立后，舟山仍为定海县，属宁波专区，1987 年撤地建市，成立地级舟山市。至 2011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便成了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

舟山在很早时期就有了人类海事活动的记录。在舟山朱家尖镇的蜈蚣峙出土文物中，包含了西汉吕后二年的“八铢八两”钱到南梁时期的“对文五铢”钱，这些表明了早在西汉时期，舟山已有了商贸活动。由于舟山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舟山的商贸活动也大多限于国内，鲜有关于与海外地区发展往来的海上贸易活

动的记录。至唐代时期，随着李唐王朝的兴盛、综合国力的提升，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对外交往也日渐繁荣，舟山的海滨优势得到发挥，成为对外交往的海上重要门户。舟山所在的明州（今宁波）也与交州、广州、扬州成为当时的四大名港。明州也成为商贸团体频繁往来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的要道，也是唐朝遣唐使登陆的主要港口。如《三国志·魏志》的记载，唐朝时期，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日本在没有与新罗政府交好的情况下，只能将原来从登州入唐“更由明、越州朝贡”[12]而“舟山群岛因为是进出明州港的必经之地，成了使节和商旅传入中国的中转站和避风港。”[13]据南宋著名地理学者王象之在其所著《舆地纪胜》的记载，新罗、高丽、日本、渤海等诸国船只都曾在昌国县梅岑山（今普陀山）一带候风航行[14]。又如唐天宝年间，著名律学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其中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都经过舟山群岛[15]，其第六次东渡是从黄泗浦（今江苏张家港）出发，沿长江东行至苏州，再经舟山群岛南下横渡东海至日本九州。

宋元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南移，浙东地区也逐渐成为了经济与文化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浙东在对外贸易与交流的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如《宋史·高丽国》所载，在北宋灭亡后，宋丽之间因北方航路衰落，熙宁七年（1074 年）高丽遣使奏请“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16]。在“元丰法”（1079 年）中还规定明州为宋丽之唯一进出口岸。元丰初年，即 1078 年，明州还奉旨在今镇海的定海县出海口修建了“高丽贡使馆”，又建了“为丽使往还赐宴之地”的航济亭，神宗皇帝也给这两处赐了名。可以看出，明州是宋元时期通往朝鲜半岛的主要航道，舟山作为这条航道的入海口，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明州港不仅是通往朝鲜半岛的主要航道，同时还是通往日本和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宋元两朝与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其他东北亚政权之间的交往以明州港为主。……舟山群岛因位于明州与上述地区进行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受益于浙东经济的发展与海上贸易的繁荣，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了较大提高。”[17]至明代时期，由于洪武十九年（1386）朝廷实施禁海政策，舟山作为海上贸易重镇的地位逐渐被削弱乃至完全淡化。但这依然不能否定舟山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不能否定舟山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3 海上丝绸之路与舟山佛教

舟山作为浙东入海口，在对外交往与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文化传播中，舟山同样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就舟山的文化而言，最具代表的莫过于以普陀山为中心的佛教文化。

舟山普陀山的佛教文化是以观音文化为中心的。观音信仰虽然出于印度佛教信仰之中，但经由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至唐宋以后其普及程度已经超出了佛教的范围，被道教与民间信仰所吸收，观音信仰也由此走出佛教的范围而成为中国的全民信仰。随着中国与朝鲜半岛及日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观音信仰也由此而传播到韩国及日本等地。观音信仰的发展于是形成了以中国为基点向周边地区进行发散的传播模式。而舟山也就成为了观音信仰对外传播的窗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起着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普陀山作为舟山佛教文化的中心，但其开山却是比较晚的。关于普陀山开山的记载，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依据文献认为普陀山“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时期就已经开山建寺[18]。又如《普陀山志》所载：“唐大中（847-860）年间，有天竺（古印度）僧来山礼佛，传在潮音洞前目睹观音示现。”[19]综合而言，笔者认为唐大中年间普陀山始建佛教是比较合理的。实际上，在此之前，舟山就已经在佛教东传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3.1 鉴真东渡与舟山

鉴真大师是唐代以律学著称的高僧，天宝元年（742 年），日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在抵达长安后又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法。在经历了六次赴日壮举之后，终于在 754 年抵达日本九州，后入日本奈良，在日本东大寺设戒坛传戒，创唐招提寺，创立日本律宗，鉴真也因此被尊称为“过海大师”“日本律宗初祖”，成为唐代文化输出的巅峰，也是中日友好交流的象征。

如前文所述，鉴真的六次东渡，大多与舟山有关。在《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中，就有很多涉及到舟山的内容，如：

> 天宝二载十二月，举杭东下，到狼沟浦，……下至大板山泊舟去不得，即至下屿山。住一月，待好风发。欲到桑石山，风急浪高，……风停浪静，白水郎将水米来相救。又经五日，有逻海官来，问消息。申牒明洲，洲大守处分，安置鄮县山阿育王寺。[20]

上文中涉及到较多的地名，如狼沟浦、大板山、下屿山、桑石山、明洲、鄮县山等。据日本学者藤田元春的考据，狼沟浦在南通县之南，靠近狼山，位于扬子江

北岸的港口。大板山是明代地图标注的名称，现为浙江海面的大戢山，介于上海芦潮港与嵊泗泗礁岛之间，属于嵊泗县洋山镇的岛屿，现今为舟山的管辖范围。根据大板山的位置来推定文中提到的下屿山，认为下屿山为舟山群岛中的五屿，位于金塘岛北面的海面上，是舟山群岛中著名的鸟岛。桑石山为当今的榭山，在舟山岛南面，镇海半岛北面的海中。此外，文中的明州也即现今的宁波[20]。从藤田元春的考据来看，上文中所提到的地名中，只有狼沟浦不属于舟山及附近区域。但根据《鉴真和上三异事》所载：

> 天宝十二年十二月，举帆东下，到明州界狼沟浦，遭恶风浪，船被打破，人物共飘没；俄尔恶风被息，二十余人著岸免死，仍即还唐朝。[21]

依上记载，狼沟浦属于明州界，即属于浙江宁波的管辖范围，这也就表明狼沟浦并不是扬子江北岸的港口，而是舟山附近的海域范围。

又如《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

> 天宝七载春……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明日得风，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暑风山。……少时，风起，指定岸山发。[22]

此中提到的地名之中有三塔山、暑风山和顶岸山，这三处都是属于舟山的管辖范围。三塔山即当今的定海海中的小洋山。小洋山宋元时期被称为三姑山，如《宝庆四明志》所载：

> 三姑山（即三姑礁）系北洋冲要之地，凡海舟自山东放洋而南欲趋浙之东西，必自此分。[23]

由此可以确定小洋山（三姑山）的位置。另外，据200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徐作生《小洋山鉴真手迹》一文中，小洋山还存在鉴真大师书写的“注焉不满”手迹，这也表明了鉴真大师的这次东渡与小洋山的关系。

至于文中提到的“暑风山”，汪向荣认为是舟山岛附近[24]。郭振民则认为该山就是曙峰山，即今舟山本岛[25]。关于“顶岸山”，藤田元春认为是在舟山列岛南，属于象山的珠岩山。而安藤更生则认为“顶岸山”应该在普陀山南的朱家尖[24]。对此，可以引《明一统志》以辅证。如《明一统志》“珠岩山”词条所载：

> 在象山县东北三十里，世传自海中见此山有宝气，故名绝顶。[26]

可以看出，顶岸山为象山的珠岩山。至于“顶岸山”究竟是不是珠岩山，不同学者还是有不同意见。即便如此，不管“顶岸山”是珠岩山，或是朱家尖，亦或是桃花岛上的对峙山，但无可否认的是顶岸山是在舟山，也就表明了鉴真东渡与舟山的关系，佐证了舟山在佛教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

3.2 慧萼与舟山

舟山在佛教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较大事件与日僧慧萼有关，也关系到普陀山作为佛教道场的开山之举。普陀山原名为梅岑山，相传在佛教传入之前，汉代方士梅福隐居山中炼丹而得名，后又一直是道教修行之地，有“海上仙山”“蓬莱胜境”之美誉。梅岑山向普陀山的转变，首先是因为舟山作为古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拥有与印度南部一样的海洋文化，更容易催生类似的海洋信仰。其次，梅岑山因其海洋环境，是海上之山，符合《华严经》中对补怛洛迦的描述，更容易来取代南印度的补怛洛迦山，为梅岑山在信仰转变后的更名提供了便利条件。普陀一词来自于《华严经》中补怛洛迦（Potalaka）的音译，因此，将梅岑山变为普陀山也必然能体现其佛教信仰。然而，普陀山佛教信仰的建立也恰好是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的体现。

慧萼是平安时代前期的僧人，关于其事迹在《元亨释书》[27]中有记载。慧萼在唐大中年间曾两次渡海入唐。他在参拜五台山、天台山等佛教胜地之后，于会昌二年（842）从明州（今宁波）回国，正是因为他的这次归国为普陀山的佛教传入带来了契机，也为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提供了佐证。

据《宝庆四明志》[28]也有记载，慧萼的这次归国是在五台山迎请观音像后，抱像从宁波归国，途中经过普陀山海域，由于船上所载物重而搁浅。在减少重物之后，船依然不得前行，只有将他从五台山迎取的观音像留下之后才能继续前行。慧萼所留下的观音像，后被称为不肯去观音，由土人张氏供奉并捐所居为观音院，由此也成就了普陀山佛教信仰。

此事，在《高丽图经》中也有记载。《高丽图经》全名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宋代徐兢撰。宣和六年（1124年），徐兢以随宋使路允迪报聘出使高丽，在考察了高丽的山川、地理、历史、文物、制度，归国

后呈所撰。《高丽图经》全书共四十卷，内分建国、世次、城邑、民庶、海道等二十八类，是研究十二世纪高丽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中《海道》六卷，记述了宋使所乘“神舟”及“客舟”的具体构造和从明州到高丽的航程。关于慧萼的记载在《海道一》“梅岑”条之中，内容如下：

> 梅子真栖隐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桥上。其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昔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焦，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于殿。……今梅岑所尊奉，即后来所作也。[29]

《高丽图经》关于慧萼事件的记载，一方面说明了慧萼事件的真实性，也说明了该事件的影响之大，至少在往返于四明与高丽的海路途中已被广泛传播，由此，也足以证明梅岑山是属于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航道。其次，《高丽图经》的作者徐兢是随宋朝使臣以从事官的身份一同出使高丽，他之所以能记载慧萼事件，是因为他们的这次远行的路线与慧萼相同，是从明州出发、经过梅岑山而抵达高丽。这也就表明了这一路线也是官方的海运路线，也为普陀山作为通往日韩的要道提供了证明。

所以，慧萼在五台山求得观音像从四明入海，经梅岑山搁浅而留下观音像，一方面为普陀山的佛教传入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说明了普陀山是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节点。徐兢著《高丽图经》对此事的记载，以官方海运路线再一次证明了普陀山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3.3 普陀山遗迹与海上丝绸之路

普陀山作为舟山佛教的代表，在海内外享有盛名。普陀山自佛教传入以来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佛教的传入对普陀山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今普陀山上仍存在很多遗迹，在这些遗迹中，也能体现舟山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1）新罗礁

普陀山上对于某些遗迹的命名，具有非常明显的海外标识。如《（乾隆）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一《形胜》记载：

> 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日本僧慧萼触舟祷佛处。[30]

依据《普陀山志》的记载，新罗礁为普陀山的一处礁石，位于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新罗礁是慧萼从五台山回日本时在普陀山海域触礁搁浅的地方。对此，《（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中也有记载：

> 宝陀寺，在州之东海梅岑山……厥后，日本国僧慧萼，自五台山得瑞相。欲返故国，舟抵新螺礁，不为动。[31]

又如《（延祐）四明志》卷一六记载：

> 此后，日本国僧慧萼，自五台山得瑞相。欲返国，舟抵新螺礁。[32]

又如《（万历）普陀山志》卷二《建置》记载：

> 梁贞明二年，日本僧慧萼得观音像于五台山，将迎归本国，舟触新螺礁，莲花当洋，舟蔽不前。[33]

以上文献中都有关于新罗礁的记载，且都是关于慧萼船只触礁的地点。至于如何体现普陀山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这需要从名称上看。新罗礁之名虽然只是对礁石的命名，但却采用的是朝鲜半岛新罗的名称，这就表明了此处一定与新罗发生了关联。据王连胜的研究，以新罗礁命名实际上是与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有关。唐太和、开成年间（827-840），素有“海上王”之称的张保皋凭借军事力量，组织了庞大的国际贸易船队，“垄断着韩、中、日沿海以及南亚一带航海活动，他们所控制的船队经常出入明州，途经马秦山（朱家尖）、石牛港（今普陀山机场）、新罗礁、梅岑山（普陀山）一带进行海上贸易和长途运输。”[34]由此，新罗礁、普陀山一带也成为新罗人往返中国与新罗的必经之路，新罗礁的出现也必然体现了新罗人经普陀山往返两地的频繁状况，体现了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2）高丽道头

普陀山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紧密关系还可以体现在普陀山的一个码头名称之上，即短姑道头。短姑道头被誉为普陀十二景之一，如《重修普陀山志》所载[35]：

> 短姑道头，在山西南隅，莲花洋达岸处。

就周应宾的《普陀山志》对短姑道头的记载来看，并不能体现它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实际上，在普陀山存在这么一种说法，认为短姑道头古称为高丽道头。这种说法也存在史料依据。如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记载：

> 补陀落伽山，自明州定海县招宝山泛海东行，两潮至昌国县，泛海到沈家门，过鹿狮山，亦两潮至山下……自西登舟，有路曰高丽道头。[36]

赵彦卫字景安，南宋绍兴年间乌程太守，后官新安郡守，其所记载的高丽道头，由“自西登舟”来看，似乎是在山的西边，与短姑道头“在山西南隅”似乎有点出入，在大体方向上相差不大，至于“短姑道头”是否就是“高丽道头”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高丽道头”的存在就像新罗礁一样，也体现了普陀山与朝鲜半岛在海运上的联系。

高丽道头是以高丽国名称来命名的，因此，它必然会与高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中有讲：

> 宝陀山不甚高，山下有居民百许家，以渔盐为业，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高丽）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37]

有如《宝庆四明志》中讲：

> 寺以观音著灵，使高丽者必祷焉。[23]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之所以用“高丽”来命名是与高丽商贾在普陀山的宗教行为有关，体现了普陀山作为佛教文化传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充分说明了舟山佛教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4 总结

海上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的一种，它不仅是商贸货物输送的交通方式，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佛教文化从印度的输入以及对日韩的输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舟山坐落于中国东海之滨，处于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海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其与海上丝绸之路会有莫大的渊源。尽管舟山很早时期就有商贸活动，但作为海上交通要道始于唐代，经过宋元的发展，舟山成为通过朝鲜半岛、日本的必经之路，因此，也给佛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传播中，舟山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律学高僧鉴真六次东渡，四次都经过舟山，与舟山产生关联。日僧慧萼的回国之途经普陀山搁浅留下观音像而成就了普陀山佛教始入的开山之举。普陀山遗迹中的新罗礁、高丽道头也在展示着普陀山与新罗、高丽的深厚渊源。这些都足以证明舟山佛教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佛教文化传播的地位和影响。

参考文献

[1] Von Richthofen F.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M].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877.

[2] 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M].東京:創元社,1968.

[3]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 1 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71.

[4] 梁启超.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2.

[5] 石云涛.六朝时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及其佛经译介[J].许昌学院学报,2012(6):76.

[6] 刘林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路佛教传播[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6,36(4):71.

[7] 高僧传:卷一[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1979:329(下).

[8] 高僧传:卷一[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1979:329(中).

[9]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1979:107(上).

[10] 高僧传:卷三[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1979:344(上).

[11] 高僧传:卷三[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1979:340(下).

[12]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 韩翔.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舟山城市变迁[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6:33.

[14] 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十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15] 徐明华,孙建军,王文洪,等.浙江舟山群岛新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J].当代社科视野,2014(4):10.

[16]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7] 韩翔.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舟山城市变迁[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6:34.

[18] 王连胜.普陀山佛教名山形成的原因探析[J].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33.

[19] 方长生,主编.普陀山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1.

[20]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

局,2000:51.

[21] 葛继勇.鉴真东渡与舟山列岛[J].扬州大学学报,2011(3):96.

[22]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62.

[23]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二十[M]//四库全书:史部.

[24]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63.

[25] 郭振民.鉴真东渡与嵊泗[M]//嵊泗列岛海洋文化专辑:一.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110-139.

[26] 明一统志:卷 46[M].

[27] 虎関師錬.元亨釋書[M]//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第 31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234.

[28]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十一[M]//四库全书:史部.

[2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M]//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

[30] 许琰.(乾隆)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一[M].

[31] 冯福京,修,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M].

[32]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一六[M].

[33] 周应宾,撰.(万历)普陀山志:卷二[M].

[34] 王连胜.普陀山的新罗礁、高丽道头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C]//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200.

[35] 周应宾.重修普陀山志[M]//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 9 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110.

[36] 王连胜.海上丝绸之路——普陀山高丽道头探轶[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2(3):11.

[37] 王连胜.海上丝绸之路——普陀山高丽道头探轶[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2(3):12.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